

袁世凯到蒋介石

——中国近代社会嬗变动因之比较

石建国

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由于传统社会遭到外来暴力的侵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冲突与变更,跌宕起伏的社会大变局中也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喜剧,白脸红脸竞相亮相,构成了一幅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全景式的画面。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历史人物则是历史的弄潮儿。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我选择了袁世凯与蒋介石这两位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叱咤风云、名声显赫而又有着某种相似经历的人物运用当今史学界比较流行的史学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法进行比较,以图发现其共有的一些特性,通过比较来揭示近代中国社会巨变过程中站在历史背后的隐蔽的力量。当然,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容纷繁复杂,远非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所能涵盖,仅仅通过个别历史人物试图去展示近代社会变迁的规律或动因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况且,随着人们历史认识的逐步客观化,历史偏见的被克服,袁世凯与蒋介石也正在以不同于先前的形象走进历史。处在不断修正中的历史人物要把握其全部确非易事,更何况存在着科学地清理过去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我的这篇文章也只能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袁世凯与蒋介石之间

· 24 ·

公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政治上的怪物在众叛亲离、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绝望地死去。仰仗辛亥革命的炮声,依靠狐朋狗党的摇旗呐喊,袁世凯从1912年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起,在短短4年时间中,其声威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成了臭不可闻的狗屎堆。时隔33年之后,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逼近成都,成都市内秩序大乱。这时,宣布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给在成都市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此时侍卫人员又发现,蒋介石的驻地出现“可疑人物”。蒋介石见势不妙,速登上“美龄号”专机,向台湾飞去。就这样,曾主宰过大陆22年的蒋介石怀着“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的悲戚心情,仓皇逃离大陆,成了一只丧家之犬。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袁世凯与蒋介石的最后一幕只是从结局上显示了这种相似。

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原理,历史比较研究的根本前提是可比性原则。袁世凯与蒋介石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是一种先后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如何体现着比较的意义呢?

袁世凯生于1859年,是河南项城人。他年轻时是个花花公子。后来,由于家境变故,

投身军队中当了一名文职官员。他的发迹是在甲午战争前后。由于很会钻营拍马，又有些才能深得权臣李鸿章的赏识，逐渐被重用。1895年中日战争后，他被派到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清朝第一支新式陆军。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年份，对于该年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戊戌变法，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不过，因与袁世凯有关而牵出了一件历史公案。对于袁世凯在维新变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他于9月20日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全盘托给荣禄，9月21日慈禧就发动了政变，百日维新失败，后人谈及此事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袁世凯之所以被维新派选中，在康有为看来，他是个通洋务、讲变法的军人，而且听说袁世凯对他康有为很钦佩，认为是可以拉到维新运动方面来的。因此就有了光绪两次召见袁世凯与谭嗣同的夜访。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书生们拉拢袁世凯的办法显然是不聪明的。即使袁世凯可靠，慈禧和荣禄能不惕防吗？袁世凯的告密行为是宦海沉浮中谄熟官场内幕卖友求荣的自保，就其个人品质来说是卑鄙无耻的。然而历史很难用个人品质来衡量，就是袁世凯后来又被“誉”为中国的“华盛顿”。袁世凯不受光绪皇帝的拉拢，出卖了维新派，因而赢得了慈禧的宠信。当李鸿章死后，他就继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除职外还有许多兼差，包括会办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关内外铁路、督办京汉铁路等等，俨然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在他直隶总督任内最后几年中已使自己成为提倡新政的积极带头人。1905年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奏请废科举兴学堂就是一例。由袁世凯这个双手沾满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鲜血的军阀侈言新政，不能不说是一种苦涩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声使蛰伏老家彰德几被裁洋杀掉的袁世凯又有了出头之日。面对辛亥革命的烈火，清王朝把袁世凯看做唯一的能够依靠的救星。而袁世凯就利用革命造成的声势对南方军政府实行又打又拉的策略，又威逼小皇帝交出了大权，终于成为

中国的权力中心。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全体共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①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作为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从来不认为在中国可以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他之所以承认共和，完全是为了尽快夺取政权，制止革命的发展。可是，他也懂得要取消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多年流血牺牲所赢得的民主共和制度，恢复专制独裁，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此，他上台后，一面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制，不择手段地巩固并扩张反动势力；一面拉拢、欺骗、分化、削弱革命党人的力量。同时，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步步紧逼，迫使革命党人交出权力。就这样，他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而终身大总统。1915年意犹未尽的袁世凯终于撕下了民主的招牌，他要堂而皇之的当中华帝国的皇帝，于是乎就有了1916年洪宪元年的复辟丑剧。历史的逻辑并不总是符合袁世凯个人的野心，昏了头开历史倒车的袁世凯就有了开头那样的结局。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而丧失信心停止奋斗，他继续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探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蒋介石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蒋介石生于1887年，1906年考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1907年被军校保送日本留学。留学期间认识了陈其美，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此后蒋介石就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了一起。辛亥革命发生后，他追随陈其美投身辛亥革命，参加反袁斗争，直至1916年5月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害。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就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在搞“联甲倒乙”^②的继续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搞“联甲倒乙”而一再碰壁的过程中，蒋

介石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提拔。蒋介石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主要是蒋介石本身的才能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才能获得了孙中山的信赖。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住地，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这是蒋介石取得孙中山信任的关键因素。此时远在上海的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毅然决然地南下广州潜入永丰舰，孙中山立即将海上指挥权交给了他。据说当时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蒋介石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这不能不使孙中山更加信赖蒋介石，而且日渐将重任托付于蒋介石。1923年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俄国考察。回国后蒋介石又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就利用校长的权力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孙中山在军事上替蒋介石日后掌握大权也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由于国共合作进行民主革命而揭开了新的篇章。1924—1927年大革命期间的蒋介石既高唱过“赞同”共产主义“仿效”苏联，“拥护”共产党的调子，为自己捞足了政治和军事资本，又在此期间制造了中山舰和整理党务案两起旨在反共的阴谋事件，1926年7月又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立下了一定的功勋。蒋介石从来就不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但也并非完全是“假革命”。1927年3月以后，直至“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叛变了革命，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这一阶段的历史，以国共合作开始，以“清党”、“反共”告终。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标志着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的变化。国民党由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变为代表买办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党，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代表买办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此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一方面极力巩固和扩充自己的权力和势力；另一方面所干的事情的核心是反共反人民。换句话说，从1927年到1937年蒋介石是一个应基本否定

的人物。之所以说是基本否定的、就在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矛盾的尖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抗战八年时期的蒋介石则是一个基本上肯定的人物，他参与领导了中国的抗战，显示出了应有的民族精神，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但始终反共，代表了他反动的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也错误地估计了他自己。于是，他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急急忙忙地挑起了一场新的内战，结果最后被赶出了大陆。

综上所述，作为比较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与蒋介石之间有着相似之处。

第一，袁世凯与蒋介石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对近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独秀就说过：蒋介石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⑤

第二，袁世凯与蒋介石都是靠军事起家的，又是靠它来维持和加强其独裁专制统治的。

第三，袁世凯与蒋介石都是利用革命的声势，使用狡猾的政治手段，凭借手中的资本，借助于帝国主义的支持而登上权力顶峰的。

第四，袁世凯与蒋介石都是破坏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祸首。背叛革命后又都与人民大众为敌，逆历史潮流而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其结局也极为相似。

第五，袁世凯与蒋介石都是地主买办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着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蒋介石作为袁世凯的晚辈同时又从时间顺序上和内容上体现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具体体现着时代的特征。

第一，袁世凯活动的时代正是满清王朝日益腐败走向最后的崩溃的时期，也是中国的志士仁人（包括孙中山在内）为民族的危

亡图存流血奋斗的时期。作为清王朝的官僚，袁世凯既镇压过革命志士与人民的反清斗争，出卖过维新志士，又主张实行新政，推动清王朝通过立宪来挽救其统治，与清王朝的当权派存在着争权夺利的一面，最终又顺应时势，迫使清王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与革命派“合演”了“皇帝倒了”“辫子割了”^④的历史。蒋介石活动的时代则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清王朝被颠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也是孙中山继续高举民主革命旗帜，致力于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时期。这一时期孙中山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不通而处于彷徨苦闷的时刻，得到了苏俄和中共的大力帮助，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蒋介石的活动很明显地与孙中山有着紧密的联系。一开始，他就是作为清王朝与袁世凯的对立面而活动的。袁世凯死后，他跟随孙中山继续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尽管情况比较复杂（前已提及不再赘述），但蒋介石某种程度上顺应着潮流，基本上是一个肯定的人物。

第二，袁世凯是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通过“南北议和”的形式合法地登上权力顶峰的；而蒋介石是利用北伐战争通过发动反革命政变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建立南京政府的方式掌握政权的。

第三，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后，继承了清王朝的衣钵，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实质上仍然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独裁统治，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显示了其极端反动性与落后性的一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无疑代表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利益；但是当江浙财团拥护蒋介石的时候，他同时又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从中我们不难窥见近代化的影子。

第四，袁世凯满脑子是独裁专制的封建主义专制思想，他的统治是赤裸裸的封建暴政，这也就不难理解他的洪宪皇帝迷梦了。蒋

介石毕竟跟随孙中山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奋斗过，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过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又拥护和继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记“三民主义”）。背叛革命后，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是五院制的政权体制也体现着形式的民主。但后来，蒋介石利用各种办法剥夺人民的各种权力，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全面走向了反动。

以上的对比分析表明袁世凯与蒋介石最后都是逆历史而动的人物，末了被历史前进的潮流所冲垮。而他们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恩格斯说得好：“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那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若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⑤袁世凯与蒋介石正是当时中国需要有的这样的人物。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个别人物的活动所提供的是一种历史的表象，在表象的背后，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制约着历史。

二、“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在成功中失败的背后

“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十多年的奋斗推翻清王朝，但成为民国元首的却是反对革命的袁世凯。这种矛盾，后人论史或归于孙中山的拱手相送，或归于袁世凯的鼠窃狗偷。然而，1912年2月15日黄兴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本日午后二时，参议院全体一致公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亿众腾欢。民国初基，赖公巩固。”^⑥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在“全体一致公举”和“亿众腾欢”的背后，是那个时候历史的选择。这不只是袁世凯个人

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就说过：事件不过是表面的变动，不过是历史上的闪光灯，“黑夜需要时，它们才闪光。”⁵²

在南北议和之际，北方的孙宝琦致电各省都督：“今者南北意见两无归宿之途，深恐停滞日久，战祸方长，万一牵及外交，为患更深。”⁵³南方的张謇的忧虑是“夜长梦多，皆由不早统一之过。若再相持，危机愈迫，祸乱不可胜言。”⁵⁴他们的忧虑共同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之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而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与孙中山相比，袁世凯更像是这样的人物。

孙中山的名声是同他的革命经历相联系的。而革命派又常被视为专事“流血破坏”之业的“乱党”，与历代草寇、盗贼无异。立宪派惧怕革命的心理与怀疑革命派的治国能力的心理促使他们倾向于选择袁世凯。不仅如此，“非袁莫属”的声浪不仅喧嚣于立宪官僚和外国公使、领事，而且在起义军和同盟会内部也有共鸣。黄兴于1911年12月就曾讲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倾全局”，“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⁵⁵更可怕的是散居于城乡的亿万小生产者，由于千百年来的小生产习惯挡住了他们的视野，对民主共和漠不关心或不信任。胡汉民在自传中曾沉思说，一般民众并非出于对“共和”、“民主”的自觉而“热烈倾向于革命”。⁵⁶民国与国民之间存在着一段客观上的距离，而这，不仅决定了当时的人心向背，而且也为此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心理基础。

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付出过自己的鲜血。然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又各有自己的选择。两者的不可调和终于导致了两者的分

裂和对抗，于是便有“四·一二”到“七·一五”的屠杀。结果，因北伐的军事胜利而首先得利的并不是革命本身，却是叛卖了革命的蒋介石。这种包含着成功的失败，同辛亥革命结局非常相似。人们常常把这一点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蒋介石的假革命。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1927年春季，与武汉政府东西对峙的蒋介石和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援。据《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了上海‘立即恢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蒋许下的‘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四月初，“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⁵⁷差不多同一时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见党国危机四伏，”集会“检举共党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实行篡窃国民党、颠覆国民政府之阴谋。”⁵⁸这些众所周知的史实实上传递出了当时的历史信息：蒋介石不仅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惧怕工农革命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支持，另外也得到象蔡元培这样德高望重的民主派的支持。在三民主义旗帜下进入国民革命的人们也把蒋介石当成了三民主义的代表。同时，中共领袖陈独秀并不懂得政治的真正含义：权力和利益，也不具备与蒋介石相抗衡的能力，且耐人回味的是：在一般民众的心理中，共产党人与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党人，其作用与影响无异。于是，蒋介石就在共产党人的失误中被推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和袁世凯一样成为秩序与和平的象征。

三、历史人物与社会的新陈代谢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推动历史发展与前进的是物质利益。同样，判断一种革命成功与否也离不开物质利益。辛亥革命的最大获益者是袁世凯，实质上也就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而广大的民众并没有因为这次革命而获得实际上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中

国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日益加深。人民大众（包括资产阶级）对袁世凯统治的不满和憎恨也日益在发展，清朝末年导致革命爆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继续激化着。《字林西报》刊载说：“商人厌于满清失德，当辛亥之变，力助革党，其结果遂推翻满廷。及癸丑之役，商民望治心殷，援助袁氏，故不数月而事变全定。总言之，则商界者，乃忍耐爱治之民也。然以商民忍耐力之富，今犹不克忍而诋排袁世凯之压制者随地而然，则袁之不得民心，从可想矣。”^④这里确实也反映了中下层资产阶级几年来对袁世凯政府态度的变化。

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者，从来都是迷信自己的实力地位，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袁世凯以他自己的实践从反面推动了人们的反思，也为自己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悲壮歌声之中。它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继续了辛亥革命没有做完的事业。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在大革命时期，“国民”一词义近“公民”，包罗了同封建势力对立的全体老百姓。因此，从中上层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又体现了历史在继续中的发展。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结论，他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⑤用这句话来为这种历史的发展作注脚是好不过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南京政权就不把工农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于是在农村，土豪劣绅这个南京政权成立时要打倒的势力就成了其统治乡村的依靠力量，成了它事实上的社会基础。蒋介石政权与土劣、地主的联合，本身也就意味着与农民的背离。在城市，资产阶级是在工人运动“赤焰熏天”的情况下给蒋介石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的。但他们并不一直支持南京政权本身，而是要“秩序”和发展

其产业及放手赚钱的条件。而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迫切需要的是资本家的钱财用于“剿共”和消除异己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其间巨大的矛盾也就产生了，以至于这些人政治上的代表大多在后来都倒向了共产党方面。蒋介石以“清党”、“反共”的契机造就了南京政府，殊不知他已把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的钥匙交到了共产党手中。蒋介石曾自命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然而真正继承并完成了孙中山事业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之后，毛泽东饱含热情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22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他的话富有历史感地把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看成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的事业在北伐战争中得到了延伸，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而袁世凯与蒋介石作为偶然性因素的消失，其背后则是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必然性。

定稿于1994年5月5日

注 释：

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见《近代史资料》总二十五号，第132页。

②“联甲倒乙”：就是孙中山采取的联合甲派军事力量，打倒乙派军事力量的军事政策。

③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1927年6月11日）《向导》第198期。

④这八个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的体验之词，它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突出成就。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200页。

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84页。

⑦（法）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方法新对象》郝名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2页。

⑧《民立报》1911年11月25日，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⑨《致唐绍仪电》(1912年3月4日)《张寿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31页。

⑩《复汪精卫电》(1911年12月9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94页。

⑪《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60页。

⑫引自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14页。

⑬《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第43—44页。

⑭《护国军记事》“外论”第516页，转引自《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64—265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第104页。

责任编辑 王克孝

(上接11页)

人类进行此一实际活动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参见拙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0年第3期)，实际上是指：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乃是检验人类认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第三，社会生产力作为人类实践的结果，乃是马克思明确的理论基点之一。因此，只要坚持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意义，只要按照马恩把生产力如实地界定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马恩〈资本论〉书信集》第16页，又见中央党校1989出版《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一书)，“生产力哲学”便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必然结论。晚年毛泽东的失误，不仅根因于《实践论》未完全从历史观角度讲认识过程，而且也在于用“社会制度标准第一”取代“生产力标准第一”，“取代”生产力决定原理。而“生产力哲学”正是在晚年毛泽东的这种失误中，在离开生产力标准只讲姓“资”性“社”问题对中国的长期困惑

中，在与实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对比中，才日益呈现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因此，可以说，“生产力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展开。或者说，它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而未细述的哲学体系的真正继承和发挥，它才是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看到，正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生产力哲学”指引下，不仅社会主义的本质被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角度作了新的详明，不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选择成为全党共识，而且，人们抛开了观察市场时的伦理尺度第一的老传统，用生产力标准第一来肯定市场(参见《邓小平文选(三)》第148页)，使经济腾飞，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离开生产力标准的“实践哲学”难以企及的，都映衬着邓小平生产力哲学的成功。

(本文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正元